

SHENBAO YU ZHONGFAZHANZHENG YANJIU

《申报》与中法战争研究

朱晓凯◎著

全 国 百 佳 图 书 出 版 单 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 山 书 社

SHENBAO YU ZHONGFAZHANZHENG YANJIU

《申报》 与中法战争研究

朱晓凯◎著

全 国 百 佳 图 书 出 版 单 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 山 书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申报》与中法战争研究/朱晓凯著.—合肥:
黄山书社, 2017.2

ISBN 978-7-5461-6325-3

I.①申… II.①朱… III.①《申报》-关系-中法战争-研究
IV.①G219.29②K256.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8134 号

《申报》与中法战争研究

朱晓凯 著

责任编辑 向焱石松

装帧设计 钱昆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230071

印刷 合肥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数 380 千

印张 19.5

书号 ISBN 978-7-5461-6325-3

定价 46.00 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http://hssbook.taobao.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51-63533725

传播学的视角 历史学的底蕴

——读朱晓凯《〈申报〉与中法战争研究》

晓凯兄新著即将付梓之际，正值他作为高层次人才，由合肥报业传媒集团引进到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之时。暑期，他来电索序，以示其职业生涯之变化。惊喜之余，又实感不妥。无论从资历、学识，还是从学科背景、研究兴趣，我均感难以胜任。然推辞再三，晓凯兄一句“别的不多说，只为学院做点贡献”的话，深深触动我心。于是，我说先阅读，而后再汇报自己的学习收获。

晓凯兄有着深厚的历史学研究背景，又在媒体工作近二十年，选择报刊史作为自己主攻方向，这既是其学术兴趣的自然选择，也是彰显其学识的优长路径。若将晓凯兄学术路径置于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史考查，我们似乎能发现一个较为明显的规律。在新闻传播学科兴起之初，包括该学科的倡导者们，多是从事文史哲等领域的研究者；伴随着新媒介不断崛起以及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新闻传播业务研究急需专门人才加入，一批深耕新闻传播领域者成为主力军。于是，我们看到了新闻传播学科日新月异的变化。不过，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这就是我们呼吁多年的新闻传播学科“本土化”建设，其进程缓慢，行程也较艰难。究其原因，新闻传播学的本土研究跟进不力是至为关键的因素。由是，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螺旋式循环的新起点，急需一批熟悉现代传媒而又具有深厚国学底蕴的研究者参与进来。由此，我想晓凯兄从媒体回到高校从事新闻传播的教学与研究，其动力正是源自这种自觉的认识与历史责任感。

带着这些思考，阅读晓凯兄《〈申报〉与中法战争研究》书稿，上述一己之揣测伴随着阅读的过程一一得以印证。可以说，从话题的选择、研究的方法、阐释的思路到课题价值的预判，均彰显着晓凯兄将传播学与历史学结合，通过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本土研究，自觉地求索新闻传播学“本土化”的治学用心。

在中国近现代报刊史上，1872年创刊、1949年停刊的《申报》，无疑是历时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中文报刊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同时代的华文报纸，《申报》是遵循西方大众传媒的经营模式，以中国人为主要受众的中文商业报纸。本着“夫新报之开馆，大抵以行业营生为计”（1875年10月11日《申报》）的办报宗旨，为了争取更多的中国读者，尽管《申报》为英人创办，但主持笔政的主要是本土的秀才们，其内容首选政治时事，其次为经济商务，而后才是市井琐闻等信息。这正如《申报》创刊号在“告白”中所言，“盖欧洲诸国近数百年来新闻纸出刊”“日新而月盛”，《申报》走的亦是“新闻纸”“新报”的办报之路，力图以“纪事之详明，议论之精实，当必大有可观者”的报道方式，冲破“稗官小说”“宫门抄”“辕门抄”“政治公报”以及“外文报的中文版”等办报办刊模式。

《申报》的办报宗旨虽受到西方近代新闻报刊理念的影响，也有“以行业营生为计”的目的，然其历时77年，中国近现代社会处于大变局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人们对获取信息的渴望，当是其生存与发展的深层原因。事实亦如此，《申报》“不专为英侨利益着眼，反为中国人筹思种种”（胡道静《〈申报〉六十六年史》），这种“本土化”的办报实践，在当时公共领域发挥着舆论传播作用。《申报》在创办不久，除了逐渐吸引了大家所熟悉的那些关心自己媒介形象的大臣、希图了解洋务的一线官员以及关注时事的清流们，其读者群更是拓展到下层的普通知识分子。兹举一例，以证此言不虚。安徽旌德人江顺诒（1823—1884，字子穀，号秋珊，别署愿为明镜生、愿为明镜室主人、嵒窳子、嵒窳生，晚号窳翁）平生屈居下僚，其最高职位是钱塘县令，然其胸怀用世之心，在研究文学之余，始终留心时务，曾撰写时政性著述《嵒窳子》三卷、《越俎卮言》二卷，集中记录晚清“西学东渐”、洋务运动在普通知识分子中的反应。那么，作为一名下层知识分子，其西学知识、时政信息从何而来？光绪壬午年（1882年），他在自序《嵒窳子集证》五卷时便有过交待：

“嵇康生作《嵇康子》三卷，出以示人，多斥其抑中而扬外，今已十余年矣。耳闻目见朝廷公卿大夫之崇论，下及草野农工商贾之私议，多有与嵇康生之说相吻合者。因援笔录之，积久成帙，乃抄与卷后以为证。庶几所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可见，《嵇康子集证》五卷乃是江顺诒撰写《嵇康子》三卷、《越俎卮言》二卷等著述的资料集。笔者曾校勘过该书，共81则，这些资料除了官员奏折、使臣日记或游记、国人西学著述等，其余主要是报刊资料，其中载于《申报》约有十则，足见《申报》对江顺诒有关洋务、时政认识的影响。

于当时，《申报》发挥大众传媒的舆论传播作用；于后世，《申报》则记录和保存了大量颇具价值的资料，堪为承载近代中国历史的最重要资料之一。其中有关战争的报道便是《申报》始终关注的最大政治新闻。对此，学界多有探讨，然多侧重于《申报》对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在民国期间的战争新闻报道。其实，正如晓凯兄指出的，“在早期《申报》对战争新闻所做的‘有影响力的重点报道’中，报道中法战争当居于榜首”。这不仅是历史学需要关注的，而且也是新闻史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话题。然而，就目前关于《申报》对中法战争报道的研究而言，亦如晓凯兄所判断的，“总的来看，《申报》舆论尚未能成为历史学研究的真正主角，它们大多还只是作为一种文献资料而存在于历史学研究之中”。有鉴于此，晓凯兄敏锐地觉察到，“将《申报》与中法战争作为一个嫁接了历史学与传播学的跨学科课题来进行研究，确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本着这种自觉的方法论意识，晓凯兄基于《申报》对中法战争的报道，考察了新闻报道中的中法战争以及这场战争中各类人物的媒介形象。不过，与一般的历史文献不同，作为新闻纸的《申报》既是记录信息的载体，又具有引领舆情的作用。若要处理好这个关系，一方面，研究者要以史家眼光钩沉史事，绘制历史画卷，揭示出新闻报道背后的历史真相；另一方面，研究者要遵循新闻传播的规律，在尊重《申报》时期办报实践的基础上，探寻历史事件报道的言说方式。我想，晓凯兄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拈出一个“与”字，将书稿取名为“《申报》与中法战争研究”，而非我们所熟知的“以……为中心”的研究路数。这一点，我们从书稿的章节安排、话题设置以及讨论的思路中完全可以得到证明。个中的中心词，或是“《申报》的战争新闻报道”，或是“《申报》的舆论”，而非“中法战争”事件本身，而第六章更是就《申

报》对刘永福、刘铭传、张佩纶和李鸿章等战时重要军政人物媒体形象的塑造进行了分析，结语又从《申报》报道基调、报道方法以及议程设置等方面，对中法战争期间《申报》舆论传播的特色进行了总结。

基于此，晓凯兄充分发扬其史学功底，在全面梳理 1872 年至 1885 年的《申报》，特别是 1883 年至 1885 年《申报》有关中法战争的新闻报道和政论之后，又对其他相关史料（如谕旨、奏稿函电等）以及相关重要人物的文集多加涉猎，力求引证确凿，言之有据，为读者贡献出首部关于“《申报》与中法战争”的系统研究成果。一方面，透过《申报》对中法战争的报道与评论，丰富了我们在这场战争本身的认知，尤其是围绕战事所出现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诸多信息，彰显出战事的立体空间，引领读者走进这场战事的历史场，也加深了对这场战事乃至人类战争本质的理解。另一方面，结合中法战争的进程，反观新闻舆论传播对战事的影响。可以说，如何从报刊舆论的导向上去关注《申报》战事报道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申报》舆论与朝野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是晓凯兄始终思考的话题。如通过《申报》早期对战事报道的研究，晓凯兄便提出了“报道清军新疆平叛：主动介入派系政争之中”；“报道朝鲜‘壬午兵变’，试图影响清廷决策”等观点。又如，通过中法战争前夕《申报》的舆论铺垫研究，指出了《申报》“判断法国侵越目的”“建言中国立场态度”的舆论态度。再如，围绕中法战争期间的《申报》舆论研究，总结出从“当战”与“当和”的舆论交织、为公众揭露法军真实情势、借助公法倡导新型国际观念等前期舆论倾向，到后来总结谋划清军战略战术、诟病清军官兵军事素质直至倡议变革清军后勤体制等诸多论点。直至中法战争结束，《申报》又从为加强国防建设建言献策、为推动洋务运动推波助澜、对“保藩固边”进行重新阐释等方面予以总结。

由此，我们可以说，《〈申报〉与中法战争研究》一书，既不是那种偏重特定媒体的狭义的新闻史研究，也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研究，而是新闻传播学与历史学的一种结合，一种以历史事件的新闻报道为内容的广义新闻史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或许更接近新闻纸的本质，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历史的另一个窗口。或许，晓凯兄的此番探索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尤其是对我这个多年来从事文学研究的门外汉而言，若想精准识得晓凯兄的为学之心，甚或发表关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展望，才是真正的难题。因此，

以上絮语，只是个人不成熟的杂感，权作我阅读晓凯兄书稿的心得，并以此作为我治学转型的自勉以及对我院新闻传播学研究团队建设的一种期待。

杨柏岭

2016 年中秋

（杨柏岭，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早期《申报》战争新闻报道分析	013
第一节 《申报》创办与早期新闻规范的建立	014
第二节 早期《申报》战争新闻报道分析	023
第二章 中法战争爆发前的《申报》舆论	040
第一节 《申报》国际视域下的法越国家形象	041
第二节 中法战争前夕《申报》的舆论铺垫	055
第三章 中法战争期间的《申报》舆论（上）	068
第一节 “当战”与“当和”的舆论交织	070
第二节 为公众揭露法军真实情势	079
第三节 借助公法倡导新型国际观念	084
第四章 中法战争期间的《申报》舆论（下）	095
第一节 总结谋划清军战略战术	096
第二节 诟病清军官兵军事素质	111
第三节 倡议变革清军后勤体制	119

第五章 《申报》对中法战争经验的总结·····	130
第一节 为加强国防建设建言献策·····	131
第二节 为推动洋务运动推波助澜·····	140
第三节 对“保藩固边”进行重新阐释·····	147
第六章 《申报》对重要人物媒体形象的塑造·····	152
第一节 刘永福与援越抗法·····	156
第二节 刘铭传与抗法保台·····	166
第三节 张佩纶与马江之役·····	177
第四节 李鸿章与中法和谈·····	191
结 语·····	205
附 录·····	248
参考文献·····	286
后 记·····	300

绪论

一、问题的缘起

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大众传媒^①究竟有着怎样的功能?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观点,上层建筑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②在“政治社会”里,国家通过法律、军队等强制方式来实现自己的领导权;而在“市民社会”中,则主要是通过道德与知识的领导来取得广泛共识,并进而获得领导权。晚清时期,以《申报》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正是试图借助舆论来对公众施加影响,进而成为公共领域中制造共识的领导者。

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最早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是它的公众性,第二是它的批判性,即“公共领域说到底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

^①传播意义上的“媒介”,是指能够负载、传播信息讯号的中介性的物质实体,被称为“传播学之父”的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称:“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构成传播的四大要素分别是传者、信息、媒介和受者,而媒介是联结传者与受众的桥梁和纽带。“大众传播媒介”则是针对个人媒介而言的,指面向公众性受传者进行信息传递时使用的媒介,它可在较大范围内同时传播相同的信息(参见冯一粟主编、周永龄主审:《大众传媒导论》,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页)。梁启超等人认为,近代中国的大众传媒发端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此前虽有西方传教士将近代报刊引入中国,但在传统氛围下,国人或视办报为“洋人营利之举”,或谓其为“莠民之贱业”,故当时报刊多属教会或洋商所办。而笔者则认为,《申报》等华文新报虽为洋商所办,但从其办报宗旨和所发挥的政治、社会功能等来看,已经可以被称为是近代中国的大众传媒。

^②(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页。

关直接相抗衡。”^①可见，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因为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首要的是要营造出一种游离于国家之外的‘舆论环境’和‘对话场所’，其中大众传媒在数量上的规模化和结构上的民间化是公共舆论形成的先决条件”^②。近年来，借助“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来重新解读近代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过程，正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

许多早期维新派思想家在描绘师法西方的变革蓝图时，都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对大众传媒扮演舆论领导者角色的期待。比如，郑观应就声称：“英国议政者，必以日报为众民好恶之所在，而多所折衷。法国之从政者，则以日报为足教官吏而不敢违背。……今如欲变法自强，宜令国中各省、各府、各州、县俱设报馆。”^③而被誉为“中国记者的先行者”^④和“中国报业之父”^⑤的王韬也曾感慨：“夫泰山不择寸壤以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以成其深。然则，新报则亦何必非寸壤与细流也哉？”^⑥在这些具有变革意识的思想家看来，大众传媒“足冀政教”的独特功能，非常有助于在整个社会制造共识，以实现“变法自强”的终极目标。

在19世纪70年代的西方社会，商业报纸正逐渐取代政党报纸的统治地位，一跃而成为报界主流。而早在19世纪初期，被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称为能够“知国事”“通上下”的新闻纸，便已开始在中国悄然“登陆”。由上海英商安纳斯托·美查（Ernest Major）等人于1872年4月创办的《申报》，就是这些新闻纸中最为典型的代表。“美查虽为英人，而一以营业为前提。谓‘此报乃与华人阅看’，故于言论不加束缚。有时且自撰社论，无所偏倚，是其特色也。”^⑦由于坚定地推行本土化路线，这张完全商业化的报纸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并最终成为近代中国华文报纸的一面旗帜。

①（德）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页。

② 汤黎：《近代传媒与汉口公共领域的建构（1866—1919）》，转引自《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33页。

③《盛世危言·日报下》，《郑观应集》（上册），夏东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0页。

④ 林语堂著：《中国新闻舆论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8页。

⑤ 参见傅国涌著：《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页。

⑥ 王韬：《论各省会宜设新报馆》，1878年2月19日《申报》。

⑦ 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75页。

从大众传播^①的角度看,一份报纸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制造共识的领导者,无疑还需要向社会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重点报道”^②。《申报》创办后,无论是报道“杨月楼案”或“杨乃武案”这样重大的社会新闻,还是报道中法战争或中日甲午战争这样重大的战争新闻,实际上都是在寻找推出“有影响力的重点报道”的契机。尤其是对于重大战争新闻的报道来说,由于时间跨度长,内容涉及政治、军事以及外交等诸多领域,影响又波及国际国内、朝野上下,这对于报纸借助“有影响力的重点报道”来树立舆论领导者的权威,更是有着显著功效。对此,世界各国的大众传播实践已多次证明:战争对于报业发展的确有着很强的正向刺激作用。日本学者山本文雄等人认为:“由于战争,报纸发行份数也相应增加,这一点各国报刊史都有记载。”他在谈及1877年(明治十年)日本因爆发西南战争而推动大众传媒快速发展的状况时称:这场战争“给新闻界带来了巨大变化。……(人们)希望尽早知道战况,因而竞相购买报纸,报纸得到飞速发展。”^③

中法战争爆发前,《申报》已相继对“台湾生番事件”、清军新疆平叛以及武力介入朝鲜“壬午兵变”等几场战争事件进行过报道。但由于受到这几场战争本身的时间跨度、波及范围以及影响程度的限制,《申报》的新闻报道与其后它对中法战争或中日甲午战争的高关注度以及人力、物力的高投入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即便如此,《申报》这些报道因为迎合

① 目前中国传播学界对“传播”定义尚有不同阐释,如“传播是社会信息的传递;传播表现为传播者、传播渠道、受者之间的一系列传播关系;传播是由传播关系组成的动态的有结构的信息传播过程;传播是社会性行动,传播关系反映社会关系的特点”(沙莲香);“传播是信息的双向流通过程,包括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两大类型”(李彬);“传播,即传受信息的行为(或过程)”(张国良);“传播就是信息借助一定的媒介所完成的流动过程,表现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即为信息的传递与散播。具体而言,传播是一种信息的共享、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借助于一定的传播媒介存在并反映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张艳秋、刘素云)。参见张艳秋、刘素云编著:《国际传播策划》,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

② 在笔者看来,所谓“有影响力的重点报道”,主要是指大众传媒为达到某个具体的报道目的,按照一定的报道思路,对既定报道内容在一定时期内所进行的系列组织与策划活动。“有影响力的重点报道”既有助于推动社会认同的形成,也有助于媒体自身品牌形象的塑造。

③ (日)山本文雄、山田实、时野谷浩编:《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刘明华、郑超然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29页。

了社会公众^①对战事信息的迫切需求，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比如，在报道“台湾生番事件”后，“由是人知新闻之有益，争先购阅，日销数千张”^②，进而迎来了《申报》历史上首次报纸销量的快速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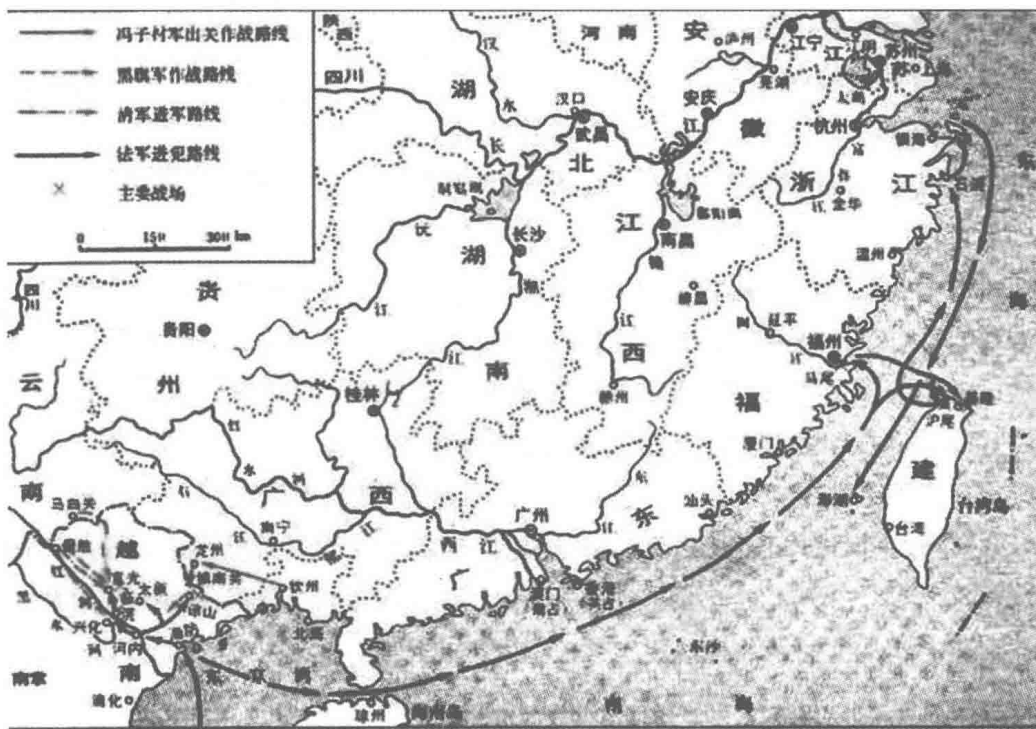
在早期《申报》对战争新闻所做的“有影响力的重点报道”中，报道中法战争当居于榜首。这首先是因为，中法战争是《申报》创办后经历的第一起真正意义上的重大对外战争事件，它持续时间长达3年，超过了清廷以往进行的任何一场对外战争；其次，它的作战区域涵盖越南北圻、福建马江、台湾、澎湖和浙江镇海等多个战场，点多面广；再者，中法战争呈现出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中法两国在战争过程中打打谈谈、边打边谈，和战交织，矛盾复杂，这种现象在清廷以往进行的对外战争中也是从未有过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众多朝野人物参与其中，他们活跃在台前幕后，或发表意见、高谈阔论，或受命出征、坐镇指挥；与此同时，各方舆论又众声喧哗，意见杂陈，建言献策者有之，抨击时弊者亦有之，这就为包括《申报》在内的大众传媒提供了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新闻素材。因此，对于《申报》的长远发展来说，中法战争的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从《申报》对中法战争报道的新闻选择、重组和凸显，进而形成公共议题，并最终试图引导舆论的清晰脉络来看，它显然是经过了精心谋划和部署，甚至还有可能是举全报馆之力而为之。据初略统计，中法战争前后（自1883年12月至1885年6月）^③，《申报》所发表的与战事有关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多达上千篇，总字数超过了百万。《申报》曾为此自夸：自“法越开衅以来，迄今五易寒暑，即中国之始与法理论，继与法交战，终与法行成，其中亦相

① 历史学者许纪霖认为，所谓“社会公众”，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固定的存在，他们是一群被现代传媒和公共舆论所建构起来的、流动的、临时的、想象性的人群。参与公共舆论的知识精英在大多数时候并不与大众直接接触，他们只是通过公众来影响大众。与宋明时期的士绅不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并不是直接面对底层民众，而是通过传媒所连接起来的知识公众，是在特定的公共空间中所聚集起来的各个阶层的知识人。而这些公众即报纸的读者，通常是底层的士绅和新式知识分子。参见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

② 黄协埙：《本报最初时代之经过》，《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1923年。

③ 关于中法战争爆发的时间，历史学界有5种不同观点：1. 1873年12月21日爆发的第一次纸桥之役；2. 1883年8、9月爆发的怀德之役和丹凤之役；3. 1883年12月14日爆发的山西之役；4. 1884年6月23日发生的“观音桥事件”（又称“北黎冲突”“谅山冲突”）；5. 1884年8月5日爆发的基隆之役。本书采用第3种看法。关于中法战争结束的时间，历史学界的看法较为一致，即1885年6月中法两国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中法新约》）。



中法战争示意图

持二年之久耳。笔者洋洋数百万言，已几罄南山之竹。”^①战争期间，见诸《申报》报端的不仅有来源广泛的动态消息、连续报道，还有观点犀利的战局分析、时事评论，同时为了让公众能更准确、更客观地了解战事，《申报》还大量摘译西字报报道，尽力提供新闻的背景材料。在当时完全商业化且又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华文新报中，《申报》对于中法战争的报道，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当仁不让地拔得了头筹，它也因此“销数益畅旺，求登广告者几为户穿。”^②

从传播学的层面看，对《申报》在中法战争期间的战事报道进行研究，不仅能够使我们深刻理解近代中国大众传媒，究竟是如何借助重大战争事件的报道，而在公共领域确立制造共识的领导者身份的，而且也可以借此触摸到《申报》在建立和完善新闻规范上的创新脉络，从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

① 《法事厄言》，1885年6月16日《申报》。

② 黄协垹：《本报最初时代之经过》，《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1923年。

识近代中国大众传媒的采访过程与报道规律。而从历史学的层面来看，作为近代中国一起具有广泛影响的重大战争事件，中法战争的历史学研究价值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主要是因为：在这场战争爆发前的40年间，曾经先后发生过两次鸦片战争，而在这场战争结束后的十多年间，又相继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然而只有在中法战争中，清廷没有在军事上吞咽战败的苦果，没有向西方列强支付巨额赔款。仅就这一点来说，中法战争就为我们提供了展开多维度历史研究的广阔空间。

也就是说，研究《申报》与中法战争，一方面可以从报刊舆论的导向上去关注《申报》战事报道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申报》舆论与朝野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这就具备了历史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另一方面，这一研究还有助于我们深入到近代中国大众传媒新闻采编这一“果核”的内部，去了解华文新报初创时期新闻操作的范式^①与规律，这就又具备了传播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

二、研究现状

中法战争虽是近代中国一起具有重要影响的战争事件，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有关中法战争的研究论文和学术专著数量相对较少，质量也参差不齐。对于中法战争展开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之后。目前，随着大量史料的发掘整理、大批论文和专著的出现，有关中法战争的研究成果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不过相比较而言，以报刊舆论为切入口、对中法战争进行的跨学科研究却显得较为滞后。迄今为止，相关论文只有数篇，学术专著更是少之又少^②。

① 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认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式或模式（Pattern）……范式起着容许范例（examples）重复的作用，其中的任一范例原则上都可用来代替这个范式。”参见（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21页。中国新闻史学者李彬认为，范式是一种框架，一种对社会的、自然的、心理的和精神的现象所赋予的整体观照。在这种框架下可能存在各种意见的分歧，甚至出现对立的观点，但它们都遵循同样的前提或假设。参见李彬著：《中国新闻社会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3页。

② 写作“研究现状”的参考文章有：黄振南：《20世纪中法战争史研究回顾与前瞻》（《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12月）；王远志：《30年来中法战争研究述评》（《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3月）；钟启顺、周秋光：《二十年来中法战争研究综述》（《河池师专学报》2003年3月）。

（一）资料整理

在中法战争的资料发掘和整理上，除了当时参与战事的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薛福成《浙东筹防录》、欧阳利见《金鸡谈荟》以及唐景崧《请缨日记》等一批个人文集相继被整理出版外，由中国史学会主编、邵循正等选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1~7册）于上世纪50年代出版，由张振鹑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1~5册）自上世纪90年代起陆续面世。这两套丛刊除收录了与中法战争有关的清廷谕旨、清朝官员和将领的奏稿函电外，还摘译了法国海军部和外交部所藏有关中法战争的重要原始档案。由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于1932至1933年陆续出版的《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共22卷，分订11册），所辑文件均选自清军机处；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纂的《中法越南交涉档》，则影印了中法战争期间清廷部分原始档案。由沈云龙主编、台湾文海出版社自1966年起陆续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共三编）所收近代史料种类繁多、取材广泛，其中有不少都涉及中法战争。

不过，围绕中法战争所进行的与《申报》有关的史料整理工作，却并未有大的进展。就笔者所知，1988年中法镇海之役资料选辑编委会在编纂《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史料》时，对《申报》有关镇海之役的报道做了辑录；由台湾大通书局出版的《〈申报〉台湾纪事辑录》，对《申报》有关法军“踞地为质”、进犯基隆和淡水的报道做了辑录，除此以外，相关资料整理并不多见。而在研究早期《申报》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涉及中法战争的史料被整理出版，如《申报》馆成立50周年时，由黄炎培等编纂的《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1923年版）纪念特刊，对中法战争期间《申报》的办报情况有所涉猎；徐载平、徐瑞芳所著《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则对中日甲午战争前20多年间《申报》主笔的状况做了大致梳理。

（二）研究成果

最近30多年来，历史学界有关中法战争的研究，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相关研究的视野正逐步扩大，涉及论题也日渐深入，一些过去的研究限制被突破，学术研究正朝着多角度、全方位的方向展开。

一批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集相继出版。如陈书麟的《中法战争》、